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3.001

■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传统思想资源^①

——以湖湘文化为切入点

彭平一, 管桂翠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尤其是湖湘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格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其形成的理论渊源与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圣贤豪杰之特质”、“恃己”和“贵我”观是分不开的。以湖湘文化为研究切入点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进行新的解读, 可以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视野, 对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湖湘文化; 经世致用; 圣贤; 恃己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4)03-0001-06

On Traditional Thought Resources of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xiang Culture

PENG Ping-yi & GUAN Gui-cu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basi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yle of Huxiang culture have mad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ass line and the independence are all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has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idea of practical utility, the traits of sages and heroes, and the idea of depending on oneself in Huxiang culture. A new study of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ba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Huxiang culture can expand the research vision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have important values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Huxiang culture; the idea of practical utility; sages and men of virtue; the idea of depending on oneself

① 收稿日期: 2013-12-23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3zzts001)

作者简介: 彭平一(1953-), 男, 湖南长沙人, 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40-47}。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毛泽东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在湖南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近代湖湘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思想风格自然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圣贤豪杰特质”和“恃己”、“贵我”观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与思维习惯,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形成提供了传统的思想资源。以近代湖湘文化为切入点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进行新的解读,可以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视野,对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重要价值。

一 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传统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出自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称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经学家颜师古训“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2]979}。它原本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强调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但是湖湘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思想风格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传统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由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命题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命题提供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两宋以来,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反对理学空谈心性命理弊端的学派也随之兴起。到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形成高潮。清前期,乾嘉考据学兴起与宋明理学形成了对立。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考据学与理学都有脱离实际的弊端,试图克服两者的弊端,从而使经学致用之学再次兴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湖湘学派的经世思潮。而这一经世思潮是以岳麓书院为重要的思想阵地。从康乾到道咸年间,岳麓书院都以经世致用为其学风特征,从而为湖湘人才群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湖湘几大人才群体都是以经世致用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同时,明清时期的一些湖湘学子试图在考据学与理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挽救理学颓废的命运。

王船山主张“理在气中”、“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注重现实实际的经世理念。他认为“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船山的“即事穷理”、“即物穷理”,为“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供了哲学基础,本身就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到晚清,曾国藩针对考据学兴起,理学地位下降的学术状况,对“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的现象颇为不满。他基于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3]166}这样,曾国藩就明确地将汉学家主张的“实事求是”中的“事”,说成就是宋学家主张的“即物穷理”中的“物”;将汉学家说的“是”说成宋学家讲的“理”,这就不仅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这两个命题统一起来,而且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为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曾国藩的这一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湖湘学人经常使用实事求是来表达认识论意义,并且将“实事求是”与西学联系起来。如郭嵩焘在对西方学术文化进行了比较多的了解后,指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4]731},并认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4]766}曾国藩的儿子,郭嵩焘外交事业的继承者曾纪泽也主张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应该多学习“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5]129}。他们都主张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讲求实学”,从而赋予“实事求是”以时代的色彩。

杨昌济对船山之学“用心尤多”,并注重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他非常赞同曾国藩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统一起来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证于今,但求证于文字而不求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6]190}因此,他主张“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7]24},强调“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7]365}。可以说,杨昌济作为20世纪前期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其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结合,使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具有更多的近代色彩。

青年毛泽东较多接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以及五四前后在长沙任教期间。毛泽东就读的第一师范的前身为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与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都是湖湘文化的重镇,亦是湖湘经世之学集散之地。在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城南书院后相继改为湖南师范馆和湖南第一师范,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8]12}这种文化氛围深深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受杨昌济的影响最深。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青年毛泽东写道:“学皆起于实践”,“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9]116-275}。与杨昌济一样,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杨昌济于1914年曾在当时的《公言》杂志上寄语学子:“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入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7]199}青年毛泽东受此影响很深,在后来出国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474}而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在《讲堂录》中记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9]587}正是因为杨昌济的影响,也是由于湖南士人历来有“游学”的传统,青年毛泽东也经常运用“游学”的方式深入农村进行调查。1917年7月中旬到8月16日,他利用暑假时间同肖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行程900余里,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这种重视实践,深入调查研究的习惯,正是湖湘文化注重实际、求真务实文化性格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摒弃了湖湘经世之学中唯心主义的因素,保存了其中重视实践、求真务实的文化特征,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逐渐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并用“实事求是”加以概括,从而完成了“实事求是”由一个中国传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命题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命题转变的过程。

二 群众路线与“圣贤豪杰之特质”

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与湖湘文化所强调的“圣贤豪杰之特质”具有密切联系。

杨昌济提出“圣贤豪杰之特质”^{[10]127},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嬗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圣人”,在这种人格结构中,“圣人的政治意义不仅是在伦理和政治上为人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且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实现政治理想的重任”^{[6]44}。但是,这种理想人格在实践中有矛盾,“即圣与王在价值目标、行为规范和实现的现实途径上都是根本对立的”^{[11]43},因此圣人难免被普通民众所否定,然而英雄豪杰却在民间得到推崇。明末清初,黄宗羲明确提

出“豪杰”的内涵,他说:“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他强调的豪杰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精神”^{[12]335}。湖湘文化中主张“圣贤救世”的英雄史观与“重视小民”,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辩证性发展,虽然二者在哲学基础上都是唯心主义,但是湖湘文化赋予了“圣贤豪杰”新的含义,更接地气,不再那么抽象。王船山在《俟解》中首次提出以“德”和“业”标准区分“圣贤”与“豪杰”。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13]魏源并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人才层次观:“有大贤,有中贤,有小贤;小贤君役,中贤君弼,大贤君师。”

杨昌济认为“圣贤”应当非常注重“合群”奋斗的群众基础。杨昌济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圣也者,积众贤而成者也;贤也者,积众人而成者也;人也者,积众物而成者也。积门人悦服之诚,而成硕儒之众望;积三军技击之勇,而成大将之威名;积匠人斧削之勤,而成工师之杰构。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7]23}虽然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可以看出杨昌济认为圣贤豪杰必须要“积众”,要有团结下层人民大众(“蓄力于小民”)的思想,并且他不认为圣贤豪杰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而主要是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而成的。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杨昌济给“合群”奋斗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此时杨师认为做大事业要充分依靠和发动最底层社会最广大的“劳动大众”,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杨昌济正是以这种“圣贤豪杰之特质”来教育自己的学生,尤其对毛泽东特别关注。1915年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麦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6]169}杨昌济详细记录了毛泽东的家庭背景、个人履历,“慧眼识英才”的杨师期望毛泽东能成为像曾国藩和梁启超那样的军事家、政治家。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

毛泽东求学期间,受杨昌济提出“国民之根本思想”的改造思想的教育和启迪,便开始寻找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究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在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原理》课期间,毛泽东写下12000余字《批注》。在《批注》中处处显现出毛泽东追求真理、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探究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强调圣贤救世时,首先应该“救小人”,指出“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毛泽东认为“自克之力甚薄”,一定“欲借外界以为策励”。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建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指出:“则诸大人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14]2}毕业之后,毛泽东秉承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中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国家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唯有民众的力量最强”,只有“民众大联合”,才可以打破“九重监狱,重见青天”。1920年10月,毛泽东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也高度评价了民众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作用。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摒弃了“英雄史观”,对湖湘文化中“圣贤豪杰之特质”中“合群”的思想进行了扬弃,实事求是,注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他自己的群众路线观。

三 独立自主与“恃己”和“贵我”观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湖湘文化中的“恃己”和“贵我”观,主要指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勤奋努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湖湘文化中“恃己”和“贵我”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恃己”和“贵我”观形成于湖湘文化的两大渊源之中,第一个是中原儒家文化,主要是宋代理学;第二个是湖南本土文化。林增平主张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形成近代湖湘文化。他认为经过移民让湖南省人口素质得到了更新,使得湖南形成了一种放纵不羁、讲血性赤诚的乡俗民风。实际上,在此前,湖湘文化中的放纵不羁、任侠独行的习气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本土文化的影响早在这两次大移民前就已经有了,那就是源于商周时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荆楚文化。湖南在唐以前基本上是南蛮之地,民风本来就以强韧、强悍著称;同时,湖南在唐以前也是中原王朝贬谪官员放逐之地,也是失意政客和文人流浪之地,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唐朝的柳宗元等,都在湖南留下了他们的失意辞赋。这种南蛮民风与贬谪失意文化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形成恃己傲世、特立独行的士气和民风。

王船山明确提出“恃己”、自立的主张。他认为:“恃人者,不败足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邻,修德者不恃邻;学必会友,为学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创业者不恃助”,“而所恃者,终在己也”^{[15]387}。曾国藩继承了王船山“恃己”、自立的思想,十分强调人的独立性。曾国藩曾说:“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16]612}他在研究“自强之道”的洋务运动中,指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17]748}谭嗣同也提出“天下自乱而我自知”的主张,强调人要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要独立发展。尤其是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进一步阐发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的思想,说:“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

近代湖湘文化中的“恃己”与“贵我”观,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颇深,不论是读书还是做事,毛泽东认为都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养成“恃己”和自立的品格,并培养自己积极进取,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主张:“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惰者,生之坟墓。”^{[9]585}在读书治学中毛泽东提出“学宜自造”,不盲从他人。1913年,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有独立心,是为豪杰”,“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惟我”。《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写道:“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9]219-220}可见,毛泽东对敢于拼搏、敢于斗争的古之勇者的英雄气概是非常赞扬的。他还指出人的刚强意志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磨练和考验,自力更生,努力奋斗形成的。1917至1918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又阐述了“贵我”的思想,他说:“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9]231}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贵我”与湖湘文化其他代表人物的“恃己”观一样,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虽然唯意志论在中国近代具有不可否认的革命意义,但它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不可避免地具有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它在强调个体意志自由的同时,完全否认了客观必然性。”^{[18]100}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摈弃了原来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将“恃己”与“贵我”观的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本国力量,依靠本国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将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恃己”和自立的品

格,最终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

四 结 语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传统、“圣贤豪杰之特质”、“恃己”和“贵我”观,深刻并直接影响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形成,但这只是理论养料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但是也不可否认,以湖湘文化为研究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进行理论渊源的分析,有助于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域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汉)班固. 汉书[O]. [唐]颜师古疏.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 [3] 曾国藩. 诗文集·书学案小识后[C]//曾国藩全集. 长沙:岳麓书社,1986.
- [4] 郭嵩焘日记(第3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5] 曾纪泽. 曾纪泽集·文法举隅序[M]. 长沙:岳麓书社,2005.
- [6] 杨昌济. 达化斋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7] 杨昌济文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 [8]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编写组.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 [9]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10] 汪建华. 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J]. 船山学刊,2000(3):43-47.
- [11] 彭平一. 思想启蒙与文化转型——近代思想文化论稿[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 [12] 高瑞泉.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 [13] 船山全书(第12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6.
- [14]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5] 船山全书(10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 [16] 曾国藩全集(第16卷)[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
- [17] 曾国藩全集·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8] 汪建华. 近代中国的唯意志论及其历史地位[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5):97-101.

(责任校对 王小飞)